

如何抵达人的向度：方法、问题与理论 ——兼评《进城：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

王鑫

书籍信息

《进城：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郑欣等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456页。ISBN：978-7-5201-2461-4，158元。

关键词

《进城》、人的向度、方法、问题、理论

书评作者简介

王鑫，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电子邮箱：aixin7766@qq.com。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BBC中国题材纪录片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研究（2000—2015）》（项目编号：16BXW037）阶段性研究成果。

How to reach the human dimension: methods, problems and theories —— Comments on “Entering the City: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WANG Xin

Book

Entering the City: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By Zheng Xi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8, 456pages. ISBN: 978-7-5201-2461-4, RMB¥ 158.

Keywords

Entering the city, Human Dimension, Methods, Problems, Theories

Author

Wang Xi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E-mail: aixin7766@qq.com.

This paper is a phased result of the General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in 2016, “A Study of BBC Documentaries on Chinese Themes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Cultur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2000-2015)” (project NO: 16BXW037).

《进城：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以下简称《进城》）一书，是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郑欣的新著，作者通过近十年的田野调查和学术反思，呈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大地上的异乡者”繁复且细密的存在形态，并在传播学的视野下观照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实践，以及媒介环境如何影响其在社会流动中的适应与认同，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身份“再造”与城市融入，为农民工这一社会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传播学的解释框架。此外，作者以“沉浸”的方法进入研究对象，显现出传播学者对“世情”的关注、对“人”存在的关切，并在“对话”中发现“大地上的异乡者”生存与实践的具体问题。“好的社会科学，一要‘讲理’，讲人们生活的道理，构建生活的结构机制是什么？世风民情是什么？对这种生活的内在理解是什么？二要‘动情’，人若没有感同身受的能力，没有与社会周围的感情连带，他怎么会尽可能地去包容这个世界呢？”（渠敬东，2016）郑欣教授的新著，正是这样的一种探索和实践，而本文更关心的是作者如何从方法、问题以及理论上实现了这样的初衷。事实上，关注研究方法，就是关心问题的求证过程、解释方式，以及如何得出结论。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问题理解的角度，这也是对“有限的真理”的承认。方法与理论也存在某种同一关系，比如精神分析理论，是一种研究方法；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同时也是一种理论范式，方法和理论的创新及运用又都是基于问题本身。因此，方法、理论（观念）与问题构成了一个学术研究的闭环。这其中，如何通过方法、问题与理论抵达人的向度，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之一。

一、方法的选择：用“对话”关怀和照见“人”的存在

在《进城》一书中，作者有较大的学术“野心”：在实践层面上试图发现和解决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并从传播学的视角关切媒介如何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合，重点在于考察了媒介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和引导作用；在理论层面上，作者试图“为完善和创新中国乡村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做出贡献。”（郑欣，2018：12）如何将这一学术期待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中，既体现问题意识，又能运用恰当的方法展开研究，对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毕竟《进城》一书要考察不可计数的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祛魅已经被标签化和符号化的农民

工群体，并且通过个体显现群体存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作者也坦言这是他的研究困境之一：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形形色色，生搬硬套某个方法，不仅过于粗暴，也无法保证研究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作者最终选择了质化研究方法中的“访谈”，后来郑欣教授在他的《对话大地上的异乡者》一文中，对其研究方法也进行了反思。他说，与其如此专业且略显生硬地说是“访谈”，我更愿意称之为“对话”，一种平等、信任和不受拘束的对话（郑欣，2018）。在我看来，这个补充是及时的也是充分的，只是来自象牙塔的“访问者”，与来自社会底层的“对话者”——新生代农民工之间，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种平等的自觉仍旧让人存疑。不过，郑欣教授对基于“对话”构成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敞开性和真诚性持有更多的乐观，“少一些精英视角，少一些心理优越感，多一些同理心，多一些换位思考，能够意识到‘我’也是‘大地上的异乡者’，我们的灵魂一样都在途中，也许双方就有了对话的基础。”（郑欣，2018）作者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显现了“方法”在面对具体研究对象时所呈现的客观与主观、科学与世情以及实证与思辨之间的相互“妥协”和“邀约”。

在《进城》一书中，作者努力打破单一的旁观视角，兼顾研究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以“沉浸”的方式进入到农民工的生活世界中，通过走访不同职业、年龄、籍贯、性别的农民工，在“对话”过程中，发现在媒介的渗透和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产生的身份认同的困惑和焦虑、人生规划中的努力和迷茫、人际交往中的隔离和无奈以及文化认同中的危机等，这让整个研究充满了“人情”和“世态”的真实，规避了过于精细化的研究方法所导致的“世态”和“人情”的局限，也让研究具有了更宽阔的视域。郑欣教授在《对话大地上的异乡者》一文中解释了他对研究过程中希望保持的状态和心理，以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的努力：包括祛除基本的前见，找到可以沉浸在其中的“痛点”，以“沉浸”的方式去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藉此实现真诚的交流。事实上，在真诚的前提下获取研究对象真实的想法，运用合宜的方式以及通过“沉浸”实现的理解，实际上也建构了一个“理想的沟通情境”，确保对话以及访谈效果的实现。“社会科学若没有人文性，不关心人性和文化，不关心人性得以敞开的各种丰富的维度，就不可能理解中国人真正的生活。”（渠敬东，2016）这种研究的现实性以及对方方法应用的“变通”，可能会失去“方法”的一些“好处”，比如“明晰，易标准化，可积累性，可转化”等（渠敬东，2016）。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进城》一书无疑给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又一个范本。

李金铨教授一直强调社会科学的研究要“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在笔者看来“入乎其内”就是进入到研究对象的细部和深处，并且通过不断的追问以及逐步的观察，做到从眼观到体悟再到思辨的逐层深入，正所谓“入精微而致广大”（刘勰语），只有这样，对象才能不断显现其自有之象，为研究者所见。同时又要做到“出乎其外”，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陷于对象之中不见周遭环境，不能超越具体对象也就无法实现对普遍性的寻求。郑欣教授以及研究团队用近十年的时间，“走遍江南各个城市街头，走进生产车间、建筑工地、酒吧、餐馆、理发店、奶茶店、快递收发点等工作场所，还进入工棚、食堂、居住地、网吧、广场、娱乐场所等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聚集、生活、消费的角落，并成为他们在陌生城市生存、适应过程中热心的分享者与见证者。”（郑欣，2018）在田野的过程中，不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想象、身份认同、人际交往、就业观念、再学习、职业适应、文化认同、性别认同等多个问题展开了研究，还将问题放置在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的语境之中，使研究者可以超越“机械化”的方法使用和局部研究，展现开放的研究视野，得见“森林”。正是基于大量的访谈——作者称之为“对话”，该书呈现了较好的“大地”之色。李金铨教授认为，该书为“传播学视角下中国社会变迁的本土化探索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以绣花针法和‘深描’的方式，呈现细致入微而又栩栩如生的故事，又能在繁富的故事中抽丝剥茧，提出概况和理论洞见。”（《进城》封底语）

虽然方法更多的是在工具意义上被使用，正如庄子讲“得兔忘蹄，得鱼忘筌”，但是，随着各个学科对方法的日益重视，研究方法也逐步走向精微，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较少关心“方法”所指向的问题，忽视社会整体语境以及具体的人，过于重视方法的完美、精细和可操作。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和局限性也在传播学研究中体现得非常鲜明，特别是晚近以来，这个特点尤为突出。事实上，如何利用方法抵达问题，并且在生动活泼的经验中，提出理论的分析框架，进而形成对问题的有效阐释，是尤为重要的。方法是引领研究者实现如何认识问题、找到问题、解释问题的路径，而不是为了“方法”本身。渠敬东教授也曾指出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的对象似乎不像是活生生的人，当然，研究本身也不像是活生生的人做的研究。今天很多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先把人看成机器，再用机器来做研究。”（渠敬东，2016）社会科学不仅关注社会现象如何产生、社会结构如何发生变化以及社会形态怎样转型，还需要研究其中“人的行为”并观照人的存在。郑欣教授说：“要重视和面向实际生活和工作中那些具体的，活生生的农

民工，而不是以往研究中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抽象的农民工。”（郑欣，2018：11）

“活生生”的人构成了《进城》一书在研究方法上的重要指向和最终的关切。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离不开对具体的“人”的关注，“人”有微观的具体生活，也有在宏观社会中的位置和坐标，又存于中观的社会科层之中。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社会族群，都需要在外部的世界展开，同时又要借由个人的具体经验来反观社会总体经验的构成与变迁，特别是在考察中国问题时，还应从社会、历史、人文、世态、民情等多个维度进入。从这个意义上讲，《进城》一书，以贴近大地的形态，去面对和回答问题，但是并没有沉溺于经验失去理论的洞见；也没有因为重视方法，失去对研究问题价值和意义的寻求。正是这种对现实有重要观照的研究，才有照亮现实的机会。

二、视点与问题：“移步换景”中锚定“人”的位置

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讲到看山的“三远”，即高远、深远和平远。同一座山呈现出差异，取决于“看山”的视角和位置的不同。视点，是观看的角度和位置；问题，是从不同观看的角度和位置能够看到的对象。这里想借助东西方绘画焦点和散点的差别类比当下传播学研究视点的转换：焦点强调聚焦于一点，从一点可纵深与横向拓开立体的空间，由点而至线、面、体。焦点透视的局限在于受空间的限制，视域外的东西不能被摄入。散点是中国绘画的透视方式，观察点不是固定在一个位置，也不受固定视域的限制，根据需要移步换景，各个不同点所看到的東西都可以组织进画面。因为多点成面，不拘泥于一个固定的点来聚焦空间，所以有较大的开阖。传播学研究中的焦点关注，是指研究通过对一个对象的聚焦可以折射多面的社会；散点则是一个动态的移动的角度，多视点看待某一对象在不同角度下的呈现。当下传播学研究的视点，大多类似于焦点透视的方式，将所有视点聚焦于一处，外部空间纷纷收向一点，这种研究特点纵深有余，细部精致、清晰，但是广度不够、视野局限，故结论在多大时空内被证实还是有诸多疑问的。

《进城》一书，突出了研究对象的流动性、生成性和变化性，是过程的考察也是现象的诠释。由于研究对象本身不是一个静态的群体，反映的问题也不是单一的，因此，在散点的视角之下，不断移动观看的位置，不仅显现出与问题相互纽结和伴生的关系，也使该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大地上的异乡者”有了多向度的呈现，比如媒介影响下的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人际交流、就业观念、职业适应、城市想象、闲暇生活、性别与文化等。一个个具体的“人”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

中凸显出来,虽然大时代的社会图景总会淹没个体的遭遇,但正是这个群像中具体的“人”才赋予了研究更鲜活的动力,被钩沉出来的这些“个体”,释放了一个普遍性问题应有的张力,使研究更加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深刻性。

视点与问题之间的关系有如经纬之绾结,始终连接在一起,这构成作者研究的意义网络。一方面,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视点,不断地进行横向的转变,涉及到社会角色、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心理、身份认同等多个维度;同时,针对这些视点的转换,显现出新生代农民工在不同角度呈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断汇聚,最终清晰化为作者探究和思考的“原动力”:媒介与社会群体之间到底形成了怎样的一种结构关系?媒介对于社会群体的适应性作用如何?新生代农民工社群的成长和流动一定是多元因素共同发生作用,既然传播是人们编织的“意义之网”的中心要素,那么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所生成的诸多问题,媒介的位置又在哪里?这些问题推动研究视点得以不断转移,引入媒介这一“变量”,很多问题就有了新的解释的可能:比如新生代农民工在新媒介主导下的虚拟交往,有力地帮助其走出“孤岛困境”;新生代农民工的再学习过程,实现了外部的媒介赋权和内在的资本自致等。此外,《进城》一书也从社会文化、消费休闲、身份认同等多个视点观察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位置。这些考察多是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上的探究,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最难的方面,实现人在社会上的区分,更微妙的作用部分仍旧依赖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通过与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对话,《进城》从公共生活、话语方式、休闲方式、人际交往等方面,揭示出农民工始终在一个原生社群中交流并存在,很难进入市民阶层或者其他社会阶层。虽然城市生活表现为具体的衣、食、住、行、用等具体方面,但其精神性和文化性更能彰显“城”的内涵和精神核心。有形的“城”容易进入,但是无形的“城”始终让城市新生代农民工游离其外。从融入的期待到自我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进城”路上,仍然困难重重。《进城》一书正是通过不断转换视点,从不同角度全景式的观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适应性问题,并从四条线索,即新媒介环境、新适应能力、新城市生活与新身份认同,“描摹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适应的动态过程。”(郑欣,2018:432)正如作者所言,“该群体如何实现自身社会角色、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转变,并重构现代性以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会,最终实现从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郑欣,2018:3)这是《进城》关注的重点,也是该书力图解决的问题。

移动的视点使问题的提出具有了较大的开阔性,显现出“世情”和“人情”的

双重特色，对问题的分析也体现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共情和共感”。正因为田野调查使作者有了更切身的经验，因此对媒介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性方面有较强的乐观；但是从另一条隐匿的线索中又可以发现某种隐忧：没有文化认同，不能祛除认同危机，新生代农民工仍旧是城市的外来建设者、没有多少文化和技术的打工者、“看起来很美”的生活的扮演者，“回不了的家”和“进不去的城”的撕裂感始终交织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文化是一种“感觉结构”，对一种生活经验的拥有，则是对另一种生活经验的弃绝。这种文化的“进城”相对于其他融入更加的困难。事实上，媒介在某种程度上会加深社群的区分裂隙，深化彼此精神世界的“鸿沟”。“技术实现了用户对媒介的功能需求，也暗含着某种‘赋权’，即根据实名认证或者用户在微媒介上的‘痕迹’，判定用户的趣味、偏好，并对使用者身份进行了‘区分’，将个人镶嵌在他所属的‘圈层’之内。”（王鑫，2017）因此，这个“进城”，实际上只完成了物理空间的居住位移，以及对生活方式进行的表层“模仿”，不同文化圈层之间仍旧藩篱深重，乡村与城市二元化的基因在没有文化和教育的改造之下，这种差距始终是难以弥合的。虽然其居住环境、生活条件包括闲暇生活、消费方式都看起来像“市民”，但其仍旧是行走在“城市”的外乡人。从《进城》大量的访谈和对话中可以强烈的感受到：这仍旧是一群被标签化的群体，其知识的贫乏和视野的局限以及固有圈层的封闭，即使从服饰等外观上看不出明显的农民工特质，甚至在话语上也有了得体的修饰，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造成的区隔，仍是难以僭越的，或者在其自我实现的需要里面，过于“高难”的目标是没有被设定的。

总之，视点的转换以及与此相应的问题的提出和解释，始终贯彻在作者研究框架之中。“回到经验事实本身，遵从发现的逻辑来深入理解和分析作为行动者的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与其工作内涵和意义，力求发现作为群体成员的农民工个体与结构因素和制度因素的互动关系，通过考察个体的生活体验和实践逻辑，管窥群体的特征与一般社会过程和社会事实。”（郑欣，2018：11）作者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传播学研究视角管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背后现代性的生成及其生存逻辑，从而探讨“媒介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相互解构与重构的动态互动。这其中，暗藏着作者的一个重要声音：媒介始终是非制度性的“柔性”的力量，结构性的调整或者体制性的努力才是让新生代的农民工可以在“城里”找到归宿的“刚性”之力，是能够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适应“城里”需要的可能。无论视点如何移动，作者上述问题意识以及价值判断都深嵌其中。

三、理论的范式：在“对话”中诠释和理解“人”的经验

《进城》一书呈现了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媒介使用方面增强自身城市适应性的个体经验。经验中蕴藏着问题，对经验的剖析需要理论的“武器”。郑欣教授始终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性”这一问题主线，展开对经验和现象的理论诠释。媒介如何介入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如何在传播的视野之下描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图像，一个关键问题在于作者如何理解媒介。郑欣教授认为，应该从“一个更宽泛的视角去理解媒介，将其视作使人与人、人与事物或者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联系的渠道或方式，还原媒介本身的意义，由此可以把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这一特殊的社会化过程放置在一个更加宏大更加宽广的传播世界。”（郑欣，2018：425）正是从这一逻辑起点上理解媒介，才使《进城》一书中新生代农民工个体活生生的经验有被深入阐释的可能，而没有仅仅拘囿于一个狭义的对于媒介的理解。而在此基础上，作者为统摄全书提出的“媒介延伸”的概念，已经有别于麦克卢汉的经典阐释，基于具体的社会和时代环境以及具体的问题，有了新的理解：首先是媒介影响力的延伸，通过心理认知、思想观念、生活能力、现代性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全方位的影响，进而改变了其城市适应的方式、状态与进程；其次是媒介功能的延伸，涉及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各个层面；最后是媒介认知和关系的延伸，拓展了以往单一的对媒介文本的研究，从日常生活层面的各个领域着眼，凸显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在媒介环境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郑欣，2018：426-429）。这也是《进城》一书中值得关注的亮点。此外，在作者论及“媒介‘镜中我’：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一章提出的“‘饰’性政策”具有较大的理论阐释空间，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的“城里人”身份的向往和追求，需要不断的修饰、掩饰和装饰自己的话语、行为、服饰以及消费等，建立契合城市的身份和形象需要，这也是媒介刺激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应激反应。在分析“媒介驱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规划”一章中，作者修正了“生命历程理论”中更多关注“具体的事件和角色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媒介这一重要的社会变量在影响和改变个体命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郑欣，2018：106）这不仅提升了传播学科对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影响，同时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生命历程的剖析，更加凸显社会这一宏观世界的变迁对于个体生命的意义。

作者通过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对话”，从生活经验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使用媒介带来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自我想象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又从理论上对其进行了解释和分析。这种处理方式，使材料充满活力，也使理论不流于空洞。理

论成为解释经验现象的“武器”，但是经验材料也没有简单成为理论的“操场”。理论可以使经验材料超越其自身而具有普泛的意义，理论如果不能观照现实，不能对现实的问题给出系统的说明和解释，也就失去了作为理论的价值和意义。正如李金铨教授（李金铨，於渊渊，2018）所说的“要以‘理论’照明材料，而不是以材料迎合理论”，与此同时，“要保持对经验现象和理论视野的敏感度。”在这一点上，《进城》一书具有较好的体现。理论是对现象和现实规律的洞察，并做系统的解释和说明，有助于驱散经验的迷雾，显现事物的本来之貌。不重视理论不行，过于崇拜理论也不可，理论是一种“批判的武器”，但同时也要进行“武器的批判”。

同时，在《进城》一书里，还有多个理论和概念被运用到问题和个体经验的解释之中，比如，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塔尔德的“社会距离”、托马斯的“生命历程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以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等，并据此解释了访谈内容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媒介使用、城市想象等十余个不同的问题。作者也努力将理论、经验、问题勾连起来，形成彼此的映衬和互照，使理论不至于空泛，材料不至于肤浅，最主要的是作者一直致力于与“大地上的异乡者”进行“对话”，这是非常难得的。

运用理论解释“对话”和访谈的内容，并以此来剖析现实问题，成为该书重要的写作体例。《进城》一书写作的结构中中规中矩，以“引述——问题——访谈（对话）——阐释——结论”的论证线索也容易驾驭，就好像一堆食材，根据不同的菜系选好了制作方法，然后去烹调一样，缺少了某种对未知的探险以及陌生化的快感。虽然《进城》一书运用了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合和适应中遇到的不同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书中提出的若干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看上去像一个一个问题“孤岛”。此外，理论的产生是受特定的时代语境和具体问题的制约，理论的阐释力也会随着时代和语境的变化而发生偏移和弱化。文中虽然提及了某个理论或者概念，但并未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经验构成有力的呼应，比如“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经验和理论之间的互证关系显现的不够鲜明等，对所论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辨析和诠释。事实上，我更期待郑欣教授在大量的本土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解释中国社会问题的概念和理论，为这个实践性命题的解决提供更加有力的阐释，也使研究能够在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或理论的贯穿之下，有效衔接起各个问题。与此同时，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也希望整个研究充满探险的乐趣，乐见其中的思想之光，并由此照亮材料，而这种贡献尤其珍

贵，希望在郑欣教授未来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责任编辑：束开荣）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李金铨，於渊渊（2018）。传播研究的“跨界”、“搭桥”与“交光互影”——与李金铨教授谈方法论。《新闻记者》，（7），42-52。

渠敬东（2016）。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文化纵横》，（2），81-87。

王鑫（2017）。理解微文化——基于媒介的视角。《现代传播》，（5），21-25。

郑欣（2018）。都市田野之六 对话大地上的异乡者。《开放时代》，（6），封2-3。

郑欣（2018）。进城：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